

張覺述作集

商君書校疏

張覺◎撰

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我將自己的作品集命名為“述作集”，即源於此。不同的是，我雖然好古，卻信疑半，所以於“述”之外又不免有所“作”。

知識產權出版社
全國百佳圖書出版單位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直接資助項目
本書由上海財經大學資助出版

張覺述作集

商君書校疏

張覺◎撰



和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國百佳圖書出版單位

内容提要

本书使用国内各大图书馆所珍藏的最能反映《商君书》早期文本情况的十种重要版本进行汇校，同时又参校了古籍异文、类书引文等，在尽最大努力核对找寻正确原文的情况下，广采前人解说，对《商君书》作了兼具学术性与通俗性的注释，并以准确、明白、通俗的白话对其原文作了疏解。同时，在每篇之前撰写了提要，对其内容作了概括述评，对其真伪作了考辨。书后附有《商君书》研究资料以及《申子》、《慎子》校正本，所以本书实是《韩非子》之前先秦法家经典的集大成之作。

责任编辑：江宜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商君书校疏/张觉撰.—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6

（张觉述作集）

ISBN 978-7-5130-1093-1

I. ①商… II. ①张… III. ①商鞅变法②商君书—研究 IV. ①B226.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57625号

張覺述作集·商君書校疏

ZHANGJUE SHUZUOJI · SHANGJUNSHU JIAOSHU

張覺撰

出版发行：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1号

网 址：<http://www.ipph.cn>

发行电话：010-82000860转8101/8102

责编电话：010-82000860转8339

印 刷：北京富生印刷厂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版 次：2012年8月第1版

字 数：577千字

邮 编：100088

邮 箱：bjb@cnipr.com

传 真：010-82005070/82000893

责编邮箱：jiangyiling@cnipr.com

经 销：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印 张：32.25

印 次：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98.00元

ISBN 978-7-5130-1093-1/B · 049 (3976)

出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張覺二〇一〇年一月四日於北京懷柔松秀園（陳先元攝）

張覺教授主要研究中國古典文獻與傳統文化、漢語言文字學。

已由19家出版社出版著作38種，主要有《韓非子導讀》（巴蜀書社1990年版）、《白話搜神記》（嶽麓書社1991年版）、《韓非子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商君書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吳越春秋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論語〉〈孟子〉精華譯評》（中國旅遊出版社1993年版）、《荀子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曾鞏散文精選》（東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潛夫論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常用成語詞典》（黃山書社2000年版）、《〈孟子〉句式變換釋例》（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現代漢語規範指南》（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2年版）、《〈韓非子〉選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商君書校注》（嶽麓書社2006年版）、《韓非子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商君書導讀》（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09年版）、《韓非子：帝王的法術》（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韓非子校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韓非子校疏析論》（知識產權出版社2011年版）。

此外，已在《文史》（北京）、《中華文史論叢》（上海）、《中國文化研究》（北京）、《學術研究》（廣州）、《漢學研究》（臺北）、《孔孟學報》（臺北）等123種刊物上發文305篇，並完成了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韓非子》微觀研究”（批准號：04BZX031）、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重點科研項目《韓非子校疏》（批准編號：0314）和《商君書校疏》（批准編號：0863）的研究工作。

現正在從事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韓非子考論》（批准號：10YJA720041）的研究工作。

述作集自序

人活在世界上，有的地位甚高，身價不菲，但終其一生，其價值仍然可以用單一的經濟尺度去衡量——一輩子賺了多少錢；有些人的人生價值就不是單用金錢所能衡量的，這就是古人所謂的“不朽”。據《左傳·襄公二十四年》記載，范宣子問叔孫豹：“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叔孫豹回答說：“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①由此看來，人的政治生命與其生理生命同樣脆弱。從政者即使能顯赫一時，但隨著其心臟停止跳動，其政治生命也往往就此結束，而不可能不朽。誠然，就是在古人心目中處於領先地位的“立德”、“立功”，我看其對後世的作用也有限。據杜預、孔穎達的注疏，所謂“立德”，是指黃帝、堯、舜之類的聖人“創制垂法，博施濟衆，聖德立於上代，惠澤被於無窮”；所謂“立功”，是指禹、稷之類的賢人“拯厄除難，功濟於時”^②。這些聖賢，雖然因其功德而名垂青史，但其功德也不過是讓人緬懷而已。由於時代的變遷，他們創制的東西早已不再有什麼實際的效應了。這種情況猶如司馬遷所感歎的那樣：“天下君王至于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③

在我看來，最有不朽效應的應該是“立言”，因為如果能“立言”於世，則可以永遠使後人在學習中獲益。誠如魏文帝曹丕之《典論·論文》所說：“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懼於飢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④

的確，人在世上走一回，唯有給社會留下一些永遠值得後人利用的東西，

①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十三經注疏》，第1979頁。

② 同上。

③ 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世界書局縮印本《史記》，第333頁。

④ 曹丕：《典論·論文》，中華書局1977年影印本《文選》，第720頁。



其生命纔有意義。否則，其存在與否也就無足輕重了。對於真正的文人來說，最高的追求應該是有不朽之作傳世吧。正是受到這種傳統思想的影響，我纔身處貧賤而仍加務於著述。但是，曹丕所說的寫文章也好，今人所說的著書立說也好，與“立言”誠然是不能劃等號的。試看今日之世界，文章浩瀚如海，圖書堆積如山，其作者都能算作“立言者”而不朽麼？顯然不能。因為如今大量的文章與圖書不過是印刷垃圾而已。誠然，由於我國現在很多學術“評”“審”已成為錢權交易或有權者利用權力來合法佔有名利的一種手段，其中某些學術評價標準（如以刊物等級來評定論文優劣）也違背了由實踐來檢驗其價值的歷史法則，所以即使是如今學界所推崇的權威期刊上的論文，國家級與省部級項目中被評定為優秀等級的成果，以及獲得國家級與省部級大獎的論著，也有可能是錢權交易或嘩眾取寵的東西而難免會曇花一現。可以預言，要不了幾年或幾十年，這些東西大部分會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而無人問津。種種人為的光環再怎麼耀眼也挽救不了那些學閥與學術騙子們那脆弱的學術生命，那些無所不用其極而攫取了很高的地位、待遇與榮譽的“學者”們未必就能永垂不朽，而只能是“當時則榮，沒則已焉”。歷史是最公正無私的評判者。只有通過歷史的沖刷而流傳不衰反復重印的著作纔是不朽之作，只有貢獻了傳世之作的人纔能永遠活在人間。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我纔甘心久坐冷板凳，常泡圖書館，長年累月孜孜矻矻，不遺餘力精益求精，其目的無非是想使拙著贏得讀者的青睞而久傳於世。

據孔穎達的說法，“立言謂言得其要，理足可傳”，“老、莊、荀、孟、管、晏、楊、墨、孫、吳之徒製作子書，屈原、宋玉、賈逵、楊雄、馬遷、班固以後撰集史傳及製作文章，使後世學習，皆是立言者也”^①。如此，則我雖然努力於著述，卻又離立言者甚遠。因此，我不敢將自己的作品集名為“文集”，而用了一個前人未曾用過的名稱“述作集”。

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②我將自己的作品集命名為“述作集”，即源於此。不同的只是，我雖然好古，卻信疑參半，所以於“述”之外又不免有所“作”。換言之，即既欲有所繼承以集前賢之大成，又欲有所發明以成一家之說。竊以為惟其如此，方能使自己的作品受人青睞而不朽於世。誠如孔子所言：“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③治學不能不有所思考，有

①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其次有立言”孔穎達疏，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十三經注疏》，第1979頁。

② 《論語·述而》，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十三經注疏》，第2481頁。

③ 《論語·為政》，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十三經注疏》，第2462頁。



所創新，但思索卻又必須以學習與繼承為基礎。所以，無“述”則學無根底，無“作”則學無所成。我之追求“述而又作”，即基於這樣的認識。當然，我的這一追求也與自己的才智有關。如今很多能人名流都是天才的創新發明家，所以他們能夠“不述而作”，完成一個又一個重大課題，獲得一個又一個大獎，這是我所無法企及的。

出版文集往往是大家的事。現在我出版自己的述作集，其實並不意味著要以大家自居。我出身貧寒，命運坎坷，一生貧賤，出版述作集本是連做夢也沒有想到的事。

1949年3月9日（農曆二月初十）夜我誕生於江蘇省太倉縣茜涇鎮東街的倪家，這是當時我家借住的房子。平民百姓無家譜，所以大都不知道自己的老祖宗是誰，我家也一樣。據我父親的記憶，只知道我的曾祖叫張燕亭（1881～1944）。由於我父親外出工作，我的童年是在祖父母的撫育下度過的，因此也受到了叔父的啟蒙教育。正因為如此，我入學後成績一直名列前茅。但是，我1965年考取蘇州高級中學後纔一年，原本穩上大學的前途一下子就被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改變了，“一片紅”使我不得不帶病回鄉務農，十年青春就這樣在貧困的掙紮中耗掉了。

1977年恢復高考，我考入南京大學，接著又考入復旦大學攻讀碩士學位，但由於老家已分田到戶，我還得花不少時間回家種地。為了徹底擺脫務農生涯而潛心於治學，我1985年初畢業後放棄了在重點大學任教的機會，到了空軍政治學院任教。哪知好景不長，1989年學院首長安排我轉業到太倉縣中學教書。為了利用上海的文獻資料以從事古籍整理與研究，我只好辭不赴命而下崗待業在家。在下崗待業還未成為社會普遍現象的當時，作為一家之長，我所承受的經濟壓力、精神壓力與種種坎坷恐怕是一般人所難以想像與忍受的。

為此，我窮而發憤，夜以繼日，賣文為生，在待業的六年中，發表了一百多篇文章，還撰寫出版了《商君書·韓非子》（1990年版）、《白話搜神記》（1991年版）、《韓非子全譯》（1992年版）、《商君書全譯》（1993年版）、《吳越春秋全譯》（1993年版）、《〈論語〉〈孟子〉精華譯評》（1993年版）、《〈韓非子〉精華譯評》（1993年版）、《白話商君書》（1994年版）、《荀子譯注》（1995年版）。當然，這些成果雖然凝結著我身處逆境時的頑強、勤奮與心血，但我更要說的是，它們離不開出版界同仁的熱情幫助與支持。正是他們的雪中送炭，點燃了我熬過嚴冬的希望，增強了我抵抗強權的信心，使我身處鐵屋之寂寞而仍然不覺得孤獨，從而支撐著我艱難而順利地度過了那黑暗而冷酷的六年待業時期，同時又奠定了我的學術研究基礎。

1995年，在空軍政治學院石柏年政委的幫助下，我終於結束了待業生涯而轉業至上海財經大學基礎教學部任講師，並於1996年任副教授。此後雖然忙於教學工作，但寫書之興趣與動力猶存，故丹黃仍不絕於手，於是又有《曾鞏散文精選》（1998年版）、《潛夫論全譯》（1999年版）等新著問世。

人的希望或欲望大概總會隨著適合其發展的條件而不斷發展。在1986年，發表一篇文章就已令我高興萬分。1990年，出版一本書會令我激動好一陣子。在那個時候，哪會萌生出版論文集或著作集的奢望呢？然而，書寫得多了，也就有出版著述集的基礎與願望了。1998年開始，我將出版《張覺述作集》的計畫寄給了不少出版社，但均未成功。這究竟是什麼原因，我一時也不清楚。直到我歷經磨難於2002年又一次申報教授職稱受挫後，我纔稍微有了了悟——我非常珍視自己的著作，不過是犯了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所說的毛病：“夫人善於自見……家有弊帚，享之千金。”^①這些古籍譯注之作在大多數學者眼中其實算不了什麼學術成果。

當時某評委認為我不夠教授資格，理由主要有三條：一是我的古籍譯注之作根本不能算學術成果，二是我出那麼多書不正常，三是我的論文涉及文史哲而所申報的漢語言文字學方面的成果不突出。

沒想到我摒棄一切娛樂生活而夜以繼日地拼搏，只換到了一個否定。

當然，這種觀念也並非某評委所獨有。

在一些學者名流眼中，搞古籍譯注根本算不上學術研究，如今的社會科學課題或評獎中大多沒有古籍譯注的一席之地，即反映了這一學術觀念。有一位好心的老師曾勸我說：“你還是去搞一點學術研究，別把精力浪費在這上面。”由此我深深地感悟到古代將文字訓詁之學稱為“小學”的道理——這種既夠不上“學術”又算不上“研究”的工作，何以不“小”呢？

至於著作多不正常，中國社科院鄧尉先生也說過：“深圳有位學界朋友告訴筆者，一個40歲的人來求職，如果拿出三本專著來，你就趕緊打發他，肯定是騙子；如果拿出兩本專著來，你要懷疑；如果只拿出一本書，還可以看一看。——當然，他說的專著是有自己心得的研究成果。這話雖然有點極端，也不無道理。”^②量多者其質必不佳，而無須細看其內容。某評委大概也是以此“學術標準”來評判拙著的，他沒有把我當作騙子，已是夠幸運的了。

再者，在我們這個學科分類越來越細的“專家”時代，教授應該是某一

① 曹丕：《典論·論文》，中華書局1977年影印本《文選》，第720頁。

② 鄧尉：“怪現象：70個教師68個教授”，載《社會科學報》2001年10月25日，第6版。



研究領域的專家，文史哲兼顧只能被認為是雜而不專，這也已經是評委們普遍認可的評審準則而不再是笑話了，所以我研究面太廣而受非議也在情理之中。

當然，在職稱評審時，我沒有申訴的權利；即使有申訴的權利，也是“道不同，不相為謀”，有什麼可說的呢！我的大部分著作，從其雅俗共賞的基調中就可以看出，它們本來就是為廣大讀者寫的，而並不是為少數學界名流寫的，非要這些“專家”認可幹嗎？誠如王家范先生所說：“一個以科研為生命樂趣的人，在人文學科中尋求自身價值的人，大可以領悟禪家的態度，不必把這些看得太重。須知，參透了，必要別人承認何為？”^①

再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在古老的中國傳統中，正直之士懷才不遇本是一個永恆的主題，我的坎坷經歷不過是在續寫懷才不遇的歷史而已。從這種意義上來說，我未能順利晉陞教授也可能與某評委的學術評價根本沒有關係。因為從我校歷次的職稱評聘與各種評獎（包括學術方面的科研標兵評選）來看，起關鍵作用的還是人事關係而非學術因素。我雖然發表了不少學術論文，也完成了國家課題與省部級課題，還先後為學校建立了中國古典文獻學專業碩士點和中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碩士點，但直至今日仍然只被學校聘為國家未級（四級）教授，學校的科研標兵評了二十個而我連提名的份都沒有，其原因顯然與我的學問無關而只能歸罪於我不會“做人”了。我耿介的本性使我正直為人，埋頭治學，而我們的上司“行非伯夷也，求索不得，貨賂不至，則精辯之功息”^②，於是我因不公正的待遇起而辯之，如此就更得罪了上司，就進一步受到打壓，如此循環往復，我就只能永遠處於懷才不遇的逆境之中了。

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③生活在一個“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時代，我則永遠處於“窮而後工”的寫作逆境之中而始終未“富且貴”，當然要忍受這恥辱而不能全怪罪上司。但是，我還是執“迷”不悟，仍然埋頭於古籍校疏之中而不去逢迎領導以獲得高陞。因為阿諛逢迎雖然可獲得現時之大利，但從總體上來考量，我還不如保持自己固有的正直品性、寫出一些必傳之作更能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對於注重精神世界的知識分子來說，最值得告慰的應該是歷史的評判——世界上最無情而又最公正的審判。歷史絕不會向權貴諂媚，它既不會因為你從社會上得到了什麼就瞻仰你，也不會因為你失去了什麼而鄙視

① 王家范：“專家成見也可無意‘殺人’”，載《社會科學報》2001年10月25日，第6版。

② 《韓非子·孤憤》，知識產權出版社2011年版《韓非子校疏析論》，第189頁。

③ 《論語·泰伯》，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十三經注疏》，第2487頁。

你，而只會因為你給社會貢獻了有價值的東西而尊重你。正是在這樣的觀念中，我纔能從容面對當時空軍政治學院長官們的冷落與現在上海財經大學領導們的鄙夷。使我歷盡坎坷吃盡虧又有什麼呢？貶低我的學術成果而把我的著作斥於低質量之列又有什麼呢？無視我的學術貢獻而將我打入末級教授之列又能說明什麼呢？千古自有公論。敝帚自珍也罷，自尊自重也罷，我堅信我的著作絕不會像那些通過錢權交易而發表的“權威成果”那樣曇花一現，她們是有生命力的，她們終究會贏得社會的認可而久傳不衰，除非中國的傳統文化被徹底消滅了。

值得慶倖的是，我的古籍譯注之作也並非沒有肯定者，它們也曾受到廣大讀者乃至一些專家的青睞與讚賞，因而往往一版再版。拙著在大陸與臺灣出版後，各地讀者紛紛來信，認為它們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不同於一般的古籍譯注本，為研究古代哲學、史學乃至文學者所必讀。南京大學一級教授兼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顧問程千帆先生曾來信說：“譯注雅見功力，可寶也。”^①臺灣輔仁大學哲學系丁原植教授也來電作了高度讚揚。挪威科學院院士、奧斯陸大學東歐東亞系教授何莫邪（Christoph Harbsmeier）認為《韓非子全譯》是所有《韓非子》注譯本中最好的一種，因而將它用作為英譯《韓非子》的底本。截至2012年2月，以古籍譯注為主的拙著，累計印數已達450020部，這充分說明拙著還是有讀者的。

即使從學術的角度去考察，我以為我的工作也不乏學術價值。由於古今語言與文物典章等方面的差異，因而要使中國古代燦爛輝煌的文化典籍真正能“活著”流傳下去，使它成為當今乃至將來中華文化建設的豐富資源，必須首先做好其校點譯注工作。古人雖然將文字訓詁之學稱為“小學”，但雖“小”卻還是一門“學”，而治此“學”者也還有不少被稱為“大師”的，可見這“小”之“學”中也自有大學問，認為它不是“學術研究”實為一種偏見。就是對古籍今譯提出過嚴厲批評的高嚴先生也曾說：“古文今譯是一門大學問，非淺識末學者所能勝任。在一定意義上說，它是古籍整理研究的最高形式，只有當版本、目錄、音韻、訓詁、校勘、考訂、語法、斷句、標點的功夫都用到之後，方可談今譯；不僅如此，它還要求譯者有相當好的現代語文水準，如果讀者對像是兒童，還要掌握兒童語言的特點。正是如此，即使飽學之士，在古文今譯任務面前，尚‘戰戰兢兢，如履薄冰’。魯迅先生在《且介亭雜文二集·題未定草》曾這樣說過：‘我向來總以為翻譯比創作容易，因為至少是無須構想。但到真的一譯，就會遇到難關，譬如一個名詞或動詞，

① 張覺：“程千帆師書信三割”，載《中國社會科學報》2010年7月22日，第17版。



寫不出，創作時候可以回避，翻譯上卻不成，也還得想，一直弄到頭昏眼花……’這段話既適用外文翻譯，也適用古文今譯，充分說明，這是一項不好對付的學問，如果學無根底，是不可草率從事的！”^①高嚴先生與那些一味鄙視古籍譯注的學界名流相比，其學術眼光恐怕要高明一大截。因為高先生雖然嚴厲地指責“今譯十弊”，但對今譯工作並無偏見，而能實事求是地肯定它的學術地位。誠然，清代學者杭世駿早就說過：“作者不易，箋疏家尤難。何也？作者以才為主，而輔之以學，興到筆隨，第抽其平日之腹笥，而縱橫曼衍，以極其所至，不必沾沾獮祭也。為之箋與疏者，必語語核其指歸，而意象乃明；必字字還其根據，而證佐乃確。才不必言，夫必有什倍於作者之卷軸，而後可以從事焉。”^②這些言論應該讓那些對古籍譯注不屑一顧的學界名流好好看看。誠然，那些對古籍譯注不屑一顧的專家評委很可能是眼高手低的學閥，他們是否有“什倍於作者之卷軸”、是否能寫出高品質的古籍譯注之作都還是個問題。

可惜的只是，古籍譯注之作如今在一些學術部門中不算學術成果，於是一些專家教授因其是件吃力不討好的事而不屑為，而一些“學無根底”的人也不把它當作學術研究來從事，只是以混稿費的態度去搞古籍譯注，結果也就產生出品質低劣的古籍譯注本而為衆人所指責。對此，高嚴先生曾指出“今譯十弊”：“出版無統籌，一書有數譯，一弊；版本不求善，率爾而操觚，二弊；考校不用功，將錯而譯錯，三弊；學問不到家，譯錯不知錯，四弊；主編不統稿，前後相矛盾，五弊；選譯無標準，避難而趨易，六弊；文字素養差，生澀又費解，七弊；翻譯不到位，半白夾半文，八弊；風格不統一，忠實原著難，九弊；不求信雅達，外行充內行，十弊。”^③這種種弊端，敗壞了古籍譯注的聲譽，使古籍譯注名聲掃地，從而玷污了其中的佳作。這是很可悲的一件事。

另一件可悲的事，則是人們所說的：現在已進入了讀圖時代，青少年喜歡看的是配圖的“文化快餐”。如果真是這樣，則長此以往，中國古代豐富的文化寶藏將被埋沒而無人問津，或只能任憑那些學術騙子信口開河，嘩衆取寵。這種學風實在令人擔憂，但願將來會有所改觀。

出於信念與愛好，我並沒有因為學界對古籍譯注的指責與某些評委對拙著的否定以及青少年學風的轉向而有所動搖，而仍然潛心於我所鍾愛的古籍

① 高嚴：“今譯十弊”，載《光明日報》1992年4月26日，第3版。

② 杭世駿：《道古堂文集》卷八《李太白集輯注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續修四庫全書》1426冊，第278頁。

③ 高嚴：“今譯十弊”，載《光明日報》1992年4月26日，第3版。

校疏工作。

張之洞說：“讀書不知要領，勞而無功；知某書宜讀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①綜觀當今流行之典籍，精校之本不多。如陳奇猷的《韓非子集釋》^②與《韓非子新校注》^③，高亨的《商君書注譯》^④，均利用第二手乃至第三手材料編著而成，以致以訛傳訛，貽誤無窮。有見於此，我立志重振古籍譯注之學術風範，注重學術考校，寫出帶有學術研究味道的嚴謹而又具有較高質量的古籍校疏本。我想，做到了這一點，就一定能獲得廣大讀者的普遍認可，從而使自己的著作流傳不衰。因此，我一直沒去迎合當代的專家評委們根據其癖好所擬定的“課題指南”寫一些不能流傳於世的“專著”以獵取名利，而仍然堅持不懈，決定傾注更大的精力與財力，將以往的著作，特別是古籍譯注之作，作一次全面詳盡的考校修訂，在以往譯注的基礎上進一步彙校善本，以便使拙著成爲兼具資料性、權威性、學術性、通俗性的經典，並彙編爲《述作集》逐漸推出，供認可拙著的讀者使用。撰寫出版這些校疏之作，對我來說，可能“勞民”又“傷財”，但對於弘揚中華文化與便利廣大讀者來說，我堅信其會像《十三經注疏》那樣具有永久性的學術價值。既然如此，有少數學術權威以及領導大加否定，又有什麼關係呢？學術乃天下之公器，真正的學術成果應該經得起歷史的考驗，真正的學術評判也應該經得起歷史的檢驗。拙著的優劣，我學術水平的高下，乃至評審專家與領導們的是非，最終還得由廣大的讀者乃至後代子孫說了算。

出版述作集的夙願已經開始成爲現實，這當然是值得慶倖的。在此，我首先要向此前慷慨解囊而購置拙著的四十五萬讀者致以衷心的謝意，並希望繼續得到更多讀者的青睞與支持。因爲經驗告訴我，我的學術生命，在過去或現在，主要還是靠廣大讀者維持著，而不是靠什麼部門用經濟實力支撐著。在將來，應該也是如此。這《述作集》的出版，如果沒有廣大讀者的熱愛支持與慷慨解囊，也將會難以爲繼。只要有廣大讀者的支持，那麼少數名流的非議與領導們的否定也就無關緊要了。

當然，我也永遠不會忘記我祖父張瑞良（1902～1972）、祖母俞秀英（1909～1989）、父親張永泉（1930～）、母親林月娥（1929～）、叔父張永奎（1939～）的養育啟蒙之恩與程千帆（1913～2000）、周斌武（1924～）

① 張之洞：《書目答問·略例》，中華書局1963年版《書目答問補正》，第3頁。

② 該書於1958年由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出版。

③ 該書於200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④ 該書於1974年由中華書局出版。



等教授的精心栽培之德，如果沒有他們的培養，就沒有我的才學與成果。同樣，我也不會忘記章培恆、嚴佐之等教授對我古籍整理工作的熱情支持，不會忘記梅季坤（嶽麓書社）、李立樸（貴州人民出版社）、倪臘松（貴州人民出版社）、李大鈞（中國旅遊出版社）、金良年（上海古籍出版社）、褚贛生（東方出版中心）、宋啟發（黃山書社）、徐文堪（漢語大詞典出版社）、呂健（上海古籍出版社）、曾德明（嶽麓書社）、田松青（上海古籍出版社）、江宜玲（知識產權出版社）等出版界同志先後傾注的厚愛之情以及吳格、劉一萍、錢振民、郭立暄、龔潔榮等先生在圖書資料方面的相助之力，如果沒有他們的熱情幫助，我也不可能有這麼多逐步積累而內容豐富的著作問世。

此外，我的同事龔敏、竇麗梅，博士研究生黃吉輝，碩士研究生歐冬梅、呂佳、尤婷婷、馬靜、鄭興蘭、徐鵬、張曉曄、孫楓、劉妍妍、周娟娟、何曉芬等也曾參與過部分工作，特此說明。

總之，我謹將這《述作集》奉獻給一切愛我的讀者、親人、師長、同志、朋友、學生，並借此機會向他們致以由衷的感謝與誠摯的祝福。

但願拙著因品質之有益於讀者而流傳久遠，從而使我的感謝與祝福也與日俱增，使後人能永遠銘記愛我者的恩德，這便是我最大的幸福了。

對於拙著中的不當謬誤之處，我熱切地希望讀者批評指正，以使拙著不斷完善而成爲學習與研究中國文化者所必備的要籍。

最後，附自題二首，以與同道者共勉。

早年心慕高校潔，豈料身陷淨土黑。自古聖賢盡貧賤，何況我輩孤且直。
貧而無諂常落寞，窮且發憤勤述作。笑看有司皆走肉，傾心拙著寄寥廓。
是爲序。

張覺

1998年5月29日初稿於滬上五角場寓所

2008年6月23日再稿於滬上四平路金軒

2012年1月26日修改於南翔芳林路院邸

前 言

要研究中國文化，必須瞭解先秦的思想，那就必須閱讀先秦諸子的重要著作，當然也必須閱讀《商君書》，這可能已是所有研究中國文化的著名學者的共識了吧。例如，著名的思想文化史研究專家蔡尚思教授說：“世界思想文化史無論分爲印度、中國、西洋三大支，或東方、西方兩大支，中國都是其中一大支的重要代表。而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的許多祖師，幾乎都屬於先秦諸子。先秦時期，是中國思想文化史的重要開端，是中國思想文化史上極其輝煌燦爛的時期。先秦諸子或著書立說，或培育學子，百家爭鳴，各抒己見，爲中國思想文化的發展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先秦時期的思想文化，無論其內容、形式和學風，都對秦、漢以後的中國思想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可以認爲：不研究先秦諸子，就無法瞭解中國古代的思想文化；同樣，不研究先秦諸子，也無法真正地瞭解中國近現代的思想文化。不僅如此，要研究世界思想文化史，也必須對先秦諸子下一番功夫。”^①即使是國外的學者，也不例外。例如，美國著名漢學家史華慈被譽爲“西方所產生的最具洞見和最爲淵博的”中國思想史專家^②，他對中國進行了半個多世紀的深入研究後發現：“如果你想瞭解任何關於中國的思想，你都得去瞭解先秦的思想。”^③

張之洞說過：“讀書不知要領，勞而無功；知某書宜讀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④《商君書》固然是研究中國文化者必須閱讀的要籍，但綜觀當今的《商君書》通行本，卻尚無精校精注之作。現代爲學術界所重而較具權威性的校釋著作主要有兩種：

一是高亨先生的《商君書注譯》（中華書局1974年版）。該書的撰寫目的，主要是“給研究先秦歷史和思想史特別是儒法鬥爭歷史的同志提供初步的參考資料”^⑤，所以重於譯注而疏於校勘。作者雖然自稱其原文用的是嚴萬里校本，但實際上並未採用第一手資料，而大量承襲了朱師轍《商君書解詁》之誤^⑥，

① 蔡尚思：“影印《諸子集成》前言”，載上海書店出版社1986年影印世界書局本《諸子集成》第一冊。

② 《社會科學報》2007年3月8日第1版編者按對史華慈的介紹。

③ 劉夢溪：“史華慈：最後發表的思想”，載《社會科學報》2007年3月8日，第6版。

④ 張之洞：《書目答問·略例》，見范希曾編：《書目答問補正》，中華書局1963年版，第3頁。

⑤ 高亨《商君書注譯·叙例》。

⑥ 參見本書附錄七。

加之使用簡體字而改字甚多，未能體現善本面貌，故未足為典要。

二是蔣禮鴻先生的《商君書錐指》（中華書局1986年版）。該書寫成於1945年，改定於1949年，顯然不能反映這六十多年來的研究成果。其解釋雖頗多發明，但尚未周備。該書也未用各種善本（特別是國家圖書館所藏的嚴萬里校正繕寫本）加以彙校，因而多承襲了浙江書局翻刻的所謂嚴校本之誤，如《墾令》“民不能喜酣爽”之“喜”誤為“善”、“狠剛”誤為“很剛”，《農戰》“故民不偷營”之“偷”誤為“儉”，《開塞》“而以別險為務則有亂”之“有”誤為“民”，《弱民》之“遊處之士”誤為“遊處之壬”，《君臣》之“流徙”誤為“流徒”等等。這也說明《商君書》在校釋方面尚有待完善。

我一向認為，要使中國古代燦爛輝煌的文化典籍能“真正活着”流傳下去，使它成為當今乃至將來中華文化建設的豐富資源，首先應該做好其“存古喻今”的工作，或者說，應該做好這些典籍的校釋評論工作。若無“存古”，則會造成新書出而古籍亡的嚴重後果；若無“喻今”，則古代的典籍只能是死躺於書櫃之中。只有這一艱巨而又偉大的基礎工程完成了，我國的古籍才能流布日廣而大放異彩，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才能傳承不絕而煥發出新的活力。

我所說的存古，與張之洞所說的“精校”相類，是指在印行古籍時要完好地保存古代的珍本文字。其主要的工作就是逐一將每部典籍的現存古本進行一次科學的梳理，辨明其源流，將其中最具有價值的善本來一次彙校；然後覈定原文，寫成定本，複製出版以廣其傳；同時將彙校所得的善本異同寫入校勘記隨書印行，以便利更多的研究者取資。顯然，我所說的存古，只是一個相對的概念。要做到絕對意義上的存古，那就只能搞《中華再造善本》之類的大工程了，但那樣做，顯然不適合大部分讀者而難廣其傳，而且，讀者也難以從中一下子瞭解衆多版本之異同。

我所說的喻今，與張之洞所說的“精注”與“知要領”相類，也就是要幫助今人明白古代典籍的內容。其主要的工作就是在校定原籍文本的基礎上，廣泛吸取古今學者的研究成果，做好實事求是而又準確通俗的注疏工作，使人們正確地理解其原文；同時，還應該對其內容進行概括扼要而又深入精到的剖析與融會貫通且聯繫實際的評論，使人們深刻地領會其內涵，把握其要領，瞭解其精華與糟粕，借鑒其中具有普遍意義與實用價值的人類智慧結晶。

然而，這種既具精校精注之功力又具提綱挈領之功能的宜讀之書實在太少見了。即使是我國古代最基本的要籍，也很少能見到這種既存古又喻今的著作出現。《商君書》也無非如此。



之所以會出現上述種種現象，大概是因爲學風過於浮躁、治學不求嚴謹、學問不求扎實的緣故吧。所以，我們在具備現代意識的同時，似乎還應該繼續宏揚漢學精神。

誠然，隨着時代的進步，現代的學術研究條件比過去要好得多。即以最基本的古籍校勘而論，舊時之古籍善本往往散落於民間而難以查訪，現在則多集中於各大圖書館而便於尋檢，所以，現在進行善本彙校的條件比古代要好得多。只要我們不惜工本，這一工作是完全可以做好的。但是，人們在校注《商君書》時，卻往往滿足於使用浙江書局翻刻的所謂嚴萬里校本，藏於國家圖書館的嚴萬里校正繕寫本（浙江書局翻刻本之底本）卻一直未爲《商君書》校注者當作重要的校勘資料加以利用。如果說，當代的學風與學術評價標準並不利於善本彙校工作的展開，因爲從事這項工作，不但枯燥乏味而需要有坐冷板凳的能耐，而且需要奔波於南北各大圖書館而投入大量的時間、精力與財力，其成果又因爲缺乏當今所推崇的創新性而不被學術界認可，但無論如何，作爲一個有責任心的學者，是絕對不應該急功近利、馬虎了事的。在我看來，既然古代有《十三經注疏》之類的扛鼎之作不朽於世，那麼，我們生活在條件優越的現代社會，理應拿出超越前人而能體現當代國學水準的古籍校釋評論之作來。惟其如此，我們才能不愧對創造了光輝燦爛的華夏文明的祖先。

基於這樣的認識，我一直在朝這一方向努力。然而，我過去所撰寫的著作，爲了能順利出版，不能不屈從於出版社的體例限制，而根本不能將“存古而喻今”的設想付諸實施。即以研究《商君書》而論，過去出版的《商君書全譯》、《商君書校注》也都是如此，她們雖然已經受到了讀者的青睞，其實未足爲典要。

要使自己的古籍校注之作成爲典要，我想首先應該把善本彙校工作做好。如果其原文校定有誤，則其注疏必隨之而誤，其評論也往往會不切本義。但是，我這嚮往良久的善本彙校工作一直沒有條件付諸實施。2003年，我有幸得到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秘書處的指點，申報了古委會直接資助項目《韓非子校疏》並獲得批准，我的善本彙校工作才得以展開。2004年，我申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韓非子》微觀研究”而獲得批准，我對《韓非子》作徹底性的研究就獲得了更爲有力的支持，“存古喻今”的設想才得以全面付諸實施。

2007年3月，我的《韓非子校疏》殺青，但著書不易，出版更難，最後總算靠了呂健先生的鼎力支持，該書才於2010年3月面世。這是我所做的第